

新青年
文丛
XINQINGNIAN
WENCONG

王开岭 / 著

激动的舌头

JIDONG DE SHETOU

中国电影出版社

激动的舌头

王开岭/著



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动的舌头/王开岭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12
(新青年文丛)

ISBN 7-106-01584-9

I. 激… II. 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111 号

- 书 名 激动的舌头
作 者 王开岭
责任编辑 刘仰宁
责任校对 洁 莹
装帧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字数/2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84-9/I·0255
定 价 20.00 元

《新青年文丛》总序

魏明伦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我有“比较癖”。80年代中期，我就斗胆作过一次貌似“荒诞”的比较。把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联在一起审视；让贾宝玉与施耐庵对面谈论；请女记者陪武则天议政；邀古代芝麻官同当代审判长说法……这种出人意料的比较，收到了引人深思的特效。

近来旧技重痒，鄙人又搞比较。摆开两套书，双方都是五册。这边五册是五个凡人分著合成的《新青年文丛》，那边五册是一位教主一手炮制的“法轮功系列”。两套表面毫无联系的书，摆到一起比较内涵，针尖立即对准麦芒。一边是教主崇拜、精神控制；一边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种世界观相生相克，《新青年文丛》是“法轮功系列”的天敌！

“五四”运动81岁矣！民主科学先驱者启蒙创办《新青年》杂志多少年了？“德先生”“赛先生”在吾国的子孙繁衍如何？时至今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新青年文丛》作者这样的后代何其太少？而修炼法轮功，大搞教主崇拜，甘受精神控制的愚民又何其太多？

法轮功在当代中华如此暴发，如此蔓延，从反面说明我

们这个古老大国的民主传统何其薄弱？封建传统何其深厚？

早在法轮功尚未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之前，我曾与《新青年文丛》几位作者把杯交谈法轮功的成因。此物特怪，其横向来源是直线，纵向来源却是曲线。横向直贯西洋东洋，是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上帝之子会、大卫教的异邦弟兄。（那些外国邪教的信徒人数、队伍范围、发展速度、活动能量、后果影响，比起超级邪教法轮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法轮功横向来源于此，例证鲜活，显而易见。但是，纵向来源就复杂多了，九弯十八拐，云深不知处，有待摸清脉络。上溯狐鸣篝火、赤帝斩蛇；以及黄巾太平道、白莲弥勒教、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多是装神扮佛，设教传法，自称救世主。开初，以治病练功为幌，招揽信徒，秘密结社。教主暗藏政治野心，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时机成熟，武装暴动，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胜则称帝，败也称王。洪天王建国，明太祖登基，教主崇拜转化为帝王崇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登基的帝王传到末代，又是日薄西山，又有新的教主乱世，又是一场混战，又是一番兴亡。教主与帝王交替，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朝代改，时代变，国人的教主崇拜习惯根深蒂固，难改啊，实在难改！而国人的独立思考精神沙里淘金，罕见啊，实在罕见！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像跳大神一样大跳忠字舞！又有那么多人像跳忠字舞一样大练法轮功！

正当庞大的信徒队伍在教主的精神控制下闭目盲从之时，《新青年文丛》的作者们却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样凝眸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反对帝王崇拜，当然也反对教主崇拜。提倡独立精神，当然拒绝精神控制。《新青年文丛》字面未触法

轮功,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与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截然相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且从中联想比较出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新青年文丛》有不少篇幅对中世纪教会帝国、纳粹帝国、斯大林帝国进行深层解剖,又使我们联想比较出以上帝国的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竟与法轮功有惊人相似之处。可以说,法轮功是未上台的纳粹,纳粹是上台执政的法轮功。

至于斯大林帝国,这称谓是《新青年文丛》两位作者赠予。乍听,不合辞典规范;细思,却是名副其实。我党我国也曾声讨苏联老大哥是“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且看《新青年文丛》作者余杰、王开岭分别剖析苏俄的专辑“俄罗斯森林”、“俄罗斯课本”等等,充分证明“新沙皇”的威风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十分合适。过去,老说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定性不准了。什么叫个人崇拜?转用于歌迷影迷对刘德华、张国荣的偶像痴迷,或许切合实际。崇拜个人的众人,与被崇拜的个人,皆大欢喜,毫无血腥。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岂止是个人崇拜?乃是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集于一身,精神控制与思想改造合为一事。独裁者斯大林早已霸占的双重极权,不就是野心家李洪志梦寐以求的两层王冠吗?

如果,我的“比较癖”略有道理,就再把帝国元首加纳粹“教主”希特勒推出来,与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比较异同。在二战风云中,斯大林站在正义一方的指挥部内。但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首脑斯大林,却一贯使用法西斯手段残害本国人民。苏联领袖与德国领袖竞赛独裁,契卡与盖世太保,近卫军与党卫军,劳改营与集中营……竞赛成绩在伯仲之间。

大千世界真奇怪！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首脑，在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暴政治国、独裁愚民的基本点上，竟是这般大同小异。现如今，两位“教主”都已灰飞烟灭，而纳粹党魁阴魂不散，转化为人民圣殿教主琼斯、大卫教主考雷什之类。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散发的瓦斯毒气，转化为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内施放的“沙林”毒气。反人类、反人性、反人权、反现代文明的各种教主粉墨登场，都以救世主名义控制芸芸众生的思想。吾国被教主控制的愚民竟然数以几十万计！这种造神现象，由来已久，似曾相识，惯性推动而成，使人扼腕长叹。假若民主传统深厚，独立精神普及，何至于几十万人迷信到这步田地？封建负担沉重的中国啊，多么需要重补“五四”启蒙之课！

让激动的舌头说话，让自由的鸟儿争鸣。《新青年文丛》伴随时代之需要降生：政论、杂感、散文、游记，思辨色彩皆浓，表述方式各异。余杰之犀利、王开岭之深隽、孔庆东之幽默、杨竞之豪爽、莲子之婉约，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民主建设的砖瓦。我虽没有通读书稿，对个别文章观点也不尽赞同，仍然十分乐意应邀作序。注视这些有胆有识有志有为的青年朋友，顿觉“五四”精英没有绝嗣，毕竟还是后继有人。

万一，将来某个早晨，忽有《皇帝的新衣》闹剧露头，但愿小孩子的老实话不是来自一处。必是童声四起，真话如潮！

1999年10月于成都

序

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

摩 罗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哭泣是因为灵魂的难度与真实，是精神严肃和强烈震动的结果。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是无法抑制住哭泣的。

——王开岭

王开岭的地下室

大雪封路了。大雪封门了。太阳遗弃了茫茫雪原，天寒地冻的季节把室内也变成了寒天冻地。这样的雪夜自然孤寂而又凄凉。

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这个问题就在此刻诞生。

生一炉火，煮一壶茶，读一本书，唱一支歌。所有这些

都是好办法。可是，诞生这个问题的境遇原本就是严峻的。严峻的土壤可以产生诗意，但不是轻歌曼舞的诗意，而是惨烈而又庄严的诗意。

面对遍地大雪，第一天也许会觉得新鲜，第二天就会单调，第三天会感到死寂，第四天会觉得仇恨和无奈，第五天呢，你会发现一个岔路口，一边通向麻木，一边通向疯狂。

诗人既不会选择麻木，也不会选择疯狂。严峻的诗意就是在对麻木与疯狂的拒绝中渐渐生长出来的。

大雪把一切屋宇都变成了地下室。那些“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就在这样的冰窟里煎熬成了诗人。诗人往往生不起炉火，也少有煮茶的闲情逸致。他最需要的是与天地灵气的交流与沟通。所以，他的选择只能是读一本书。把世界从外面读到自己的内心去。然后是唱一支歌，把自己从内心唱出来，交给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孤寂的灵魂是最能够谛听远方声息的灵魂。孤寂的灵魂是最能够谛听内心世界的怒吼咆哮和喁喁轻语的灵魂。

而眼前所读的书乃是统摄整个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抽象的符咒。他所谛听到的一切具象、信息和感受，全都熔铸在这符咒之中，借着微茫的雪光扑面而来。

我第一次集中读到王开岭几万字的文章时，激动不已，马上向一位山东朋友打听他的电话号码。朋友说他没有电话。我又问他的住址，他的门牌号码，因为我想介绍另一位朋友去看他。朋友说他没有门牌号码，他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夹缝里漂流。我马上想到他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人，并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手记》及其主人公。

王开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居住在地下室的诗人。在齐鲁

大地一个寒冷而又死寂的地下室里，他用阅读和谛听的方式拥有世界，用歌唱和牵挂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他知道这种生活是严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足够让所有有地下室体验的人充分意识到它的严峻。何况，20世纪的人类境遇有了非常巨大的改变，20世纪的地下室也绝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地下室所可比拟。王开岭的著作中提到了苏联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死亡方式。在一个北方所特有的茫茫雪夜，当局把天才的诗人带到一个零下十几度的地下室里，以检查卫生为借口强迫曼德尔施塔姆脱光所有的衣服。一丝不挂的曼德尔施塔姆冻得瑟瑟发抖，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这颗赤裸裸的灵魂终于变成了一具赤裸裸的肉体。

这是既没有火炉和茶水，也没有书和歌的地下室。这就是20世纪的地下室。它一旦诞生，就永载史册，永远也不会被抹去被遗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可20世纪的地下室手记再也不是这样开头的。王开岭的书要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活得优秀一些”。

这个变化是值得重视的。19世纪的人感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了自身对这变化的不适应。究竟是社会有病，还是自己有病，他们还有点拿不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从自我质疑开始的写作策略。可是，20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使诗人对社会、文化和人类的整个游戏规则都产生了怀疑。“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殓衣盖住了这块大地/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这儿谁死了？莫不是我们自己。”（叶赛宁）经过了

这么一次残酷的死亡，他们在对人类自身的质疑上走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远，他们决意在社会、文化诸多方面重整河山。所以，住在20世纪的地下室的人，眼光更为透彻，姿态更为主动。

当然，这仅仅是遐想中的姿态。20世纪的诗人原本就是只耽于谛听和遐想的。茫茫雪夜无边无际，雪原上的征战厮杀无边无际，诗人的谛听和遐想也就无边无际。

王开岭的遐想

如果没有20世纪发生在地球上大多数地区的惨烈历史，王开岭的谛听就不会如此沉重如此丰富。如果在这段惨烈的历史中，不曾出现过王开岭所谛听到的这些故事，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人可以在天寒地冻的险境和绝境中活得如此艰难又如此英勇，甚至可以在无可逃避的灾难与祸患中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庄严与高贵。

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奖赏，不是为了领受后人迟到的赞誉。是为了捍卫良知，是为了捍卫真实，是为了捍卫人之为人的内在的尊严。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瑞典文学院宣布荣获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马上决定对这位作家进行大批判，叶甫图申科就此致电当局表示抗议。当局自然不会理会这个抗议，他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主席胸有成竹地向世界宣布：大会一致通过，将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苏联作家队伍。正当即将例行公事地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时候，台下突然亮出一个女性的声音。作家阿利卢耶娃大声说：“怎么能说一

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她的反对当然无济于事，可是她拒绝了强权对于她的名义的盗窃。所谓一致通过，包含着对所有不同意见的压制和强奸。在这一情境之中，捍卫尊严的权利坐实为捍卫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内在尊严和人格力量的体现。

早在斯大林时期，惨遭迫害的文化人特别多。光是作家，就有 2000 余人遭到杀害、监禁和流放。在那片只有两亿人口的苦难土地上，在绝大多数作家和文化贵族都流亡国外之后，2000 名作家，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全部作家了。在几乎每个作家都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严酷环境中，还有许多人活得那么高贵，活得那么庄严。在曼德尔施塔姆被内务部逮捕的那一刻，苏联作家的正义感像阳光下的喷泉一样饱满而又绚烂。诗人阿赫玛托娃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执意营救那个被誉为大诗人的年轻的受害者。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找遍了那些有权决定别人的命运的人。他先是跑到《消息报》去找布哈林，然后又给斯大林打电话。他天真而又庄严地对斯大林说：“我要同您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关于一个人的生与死……”

“一个人的生与死”问题，就包含着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整体态度。帕斯捷尔纳克所要讨论的，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极权专制主义政权的整体性质疑。要知道，在苏维埃极权专制时期，所有自由知识分子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可在关键时刻，他们内心的高傲和力量就像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期一样令人惊讶和激奋。如果再把王开岭最喜欢的索尔仁尼琴等人考虑在内，我们的惊讶和激奋会达到更高的程度。

个人情谊与关爱，没法淹没一个真正的诗人对于真理和道义的认知。苏联钢琴家尤金娜收到她的热心听众斯大林赠

送的两万卢布的时候，给斯大林写信说，“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尤金娜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崇拜其艺术的听众，肯定充满了善意和感激，何况这个听众主动送来了这么优厚的礼物。可是一个诗人的心是价值、真理和道义的承载者，诗人必须用这些伟大的事物包裹友情，而不能用友情掩盖信念。尤金娜对于犯罪个体的批评，表达了她对人类苦难的最大的悲悯和承担。

即使是与官方合作的所谓御用文人，也绝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弄臣。他们身上的俄罗斯血脉，同样饱满和旺盛。王开岭以深刻的理解和深重的敬意歌颂了高尔基的艰辛努力。“十月革命后，由于他坚持‘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对他们要加倍爱护，而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一面在自己所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大声疾呼‘这不公正！’，一面奋力抢救那些濒临危境的人。他同五位作家联名上书彼得格勒契卡，要求释放著名诗人古米寥夫，强调其对俄国诗歌的贡献。但诗人还是被以反革命罪处决了。高尔基继续为拯救关押在彼得堡罗要塞的两位亲王急往莫斯科找列宁，指出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他拿着释放证兴冲冲地赶回时，却看到了他们已被枪决的告示……高尔基还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请求‘上面’批准诗人勃洛克出国治疗，遭拒绝后又跑到政治局‘大闹一场’。当作家巴别尔即遭不测时，高尔基公开声称他是‘最诚实的作家和人’……基洛夫遇害后，苏联政坛又掀起了新的肃反浪潮，高尔基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在政权交替的时代，高尔基不仅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和文化眼光的文化人。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所特有的尊严和高贵是通过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得以体现的。高尔基对诗人和文化人的保护态度正是基于他对人类尊严的理解、尊重与捍卫。王开岭无意于多作比较，否则他可以谈谈中国左翼文化人在1949年前后，对那些取得杰出成就的文化人的围剿与迫害。这种迫害证明着中国实际上很少有文化人，大家都是政治动物。而政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中国人还是天天在角力争雄、你撕我咬的“争于力”的动物，对文化自然就没有起码的理解、敬重、保护意识，对于人和文化人就更没有这种意识。王开岭的内心肯定有种不堪回首的沉重感，所以他没有去翻动这一页。地下室的人最需要阳光的抚慰、温情的润泽，于是他就最多地遐想着阳光与温情。

与阳光和温情交融在一起的，是血性的光辉。地下室的诗人，最需要的还是血性的激励，所以他叙述阳光和温情时，总是着意突出最能体现人类尊严的血性故事。

王开岭的沉思

打开王开岭的著作，一种庄严和血性扑面而来。

一个身陷地下室、只能以谛听和遐想拥有世界的诗人，最能感到“灵魂的难度与真实”。雪原上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每时每刻的杀伐、掠夺、血腥、不义，像百川归海一样全都汇聚到这地下室来，汇聚到诗人的内心世界来。面对这份真实，他“无法抑制住哭泣”，面对这份难度，他不得不认

真寻找精神出路。

以什么姿态面对这个永远不会完美的世界？作为“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如何面对生命本身？这样的问题，让一代一代仁者和圣者备受折磨。就像世界本身永远有缺陷一样，仁者圣者所持的现实态度也是各有缺陷的。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是生命的虔敬者和悲悯者。他们无条件地主张仁爱与和平，主张对一切生命个体包括作恶的生命个体持同情与宽恕态度。他们反对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这样的主张当然是十分高贵渺远的，从学理上说，是逻辑最彻底的。可是，有人问托尔斯泰，如果你看见一个坏人正举起一个小孩要往地上摔，惟有对那个坏人射击才能挽救那个无辜小孩的生命，这时你射击还是不射击？这是道德哲学上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在伦理上精神上的矛盾。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射击，那个坏人将会在人为灾难中失去生命。如果不射击，那个小孩同样将会在人为灾难中失去生命。面对这样一个场面，无论你是否扣下扳机，你的精神信念和伦理逻辑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漏洞。这个故事几乎预示了人类在道德哲学上无法自全的宿命。

我无法估计，王开岭在这样的精神难题中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经过了数千几万次辗转反侧和痛苦沉思之后，他知道他必须作出选择。即使不能在现实行为上作出选择，至少也要在精神上找到选择的理由。

王开岭依然是从一个俄罗斯故事入手，来展开他的命题的。他把这个故事叙述得特别美特别有魅力。我禁不住要把他的叙述征引到我的序言之中，以让这篇序言生动一些。

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竟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1878年1月，她只身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朝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射了一颗子弹。

薇拉当场被捕，后移交有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此案引起了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关注，3月31日大清早，他便来到区法院，在新闻记者席上旁听了这次著名的审判。

薇拉给人的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样，与其后身材高大、手执马刀的宪兵构成了鲜明对比。人们很难将之与“凶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在等待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被告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薇拉蓄谋杀人是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

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也深深感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一向反对暴力的人，此刻却对薇拉的义举和凛勇抱以深深的敬慕……

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是夜，陀氏回到家里，激动不已，关于俄国当代青年的思想与行为问题，将之深深吸引住了。他几乎彻夜难寐，耳边始终回荡着薇拉那凛然庄严的声音，最后，他把它抄在一张小纸片上：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几天后，陀氏在给友人的信中，反驳了一些人对当代青年所谓“激进冒险主义”的指责：“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正以俄国人的勇敢、智慧和良心去探索真理……”

“必须”——这是对我震动最大的一个词。它孕含着怎样惊人的力量和决绝的信念！怎样凛然的血性之光和激烈无声的大义！我久久地思忖、体会着它，抚摩其质地、品性、硬度及光泽……

薇拉·查苏利奇的枪声无疑是庄严的。它的伟大意义已经被那位律师表述得十分准确也十分充分。它对我的震撼，不会弱于对王开岭的震撼。此间拔地而起的正义感和消灭罪恶的激情，可以得到中国读者的充分理解和尊敬。王开岭的精神倾向，已经暗含在这则撼人心魄的故事之中。

王开岭的表述虽然足够理直气壮，可还是不难看出他在精神上的犹豫和彷徨。首先，他选择一个美丽而又圣洁的少女当这个故事的主角，使这个本来就庄严正义的复仇故事具有了神圣的意味，从而具有了无可质疑的说服力（主要是用来说服自己）。第二，他反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与评价，以此证明这是无可挑剔的选择。在那些赫赫